

[人类学研究]

认同与重构:民族地区移民群体身份与认同变迁历程

——基于宁夏芦草洼的田野调查

田晓娟

(宁夏社会科学院 综合经济研究所,宁夏 银川 750021)

摘要:在移民扶贫开发史上,芦草洼移民群体按照故乡地名重新命名的“他乡”创造了一种共享的“精神家园”,成为芦草洼移民群体回忆故乡泾源老家的“想象的共同体”。人口的迁移和时空的置换致使移民群体角色的多重身份开始形成,并在其演化的过程中随着不同社会情境的变化而不断发生转换。移民群体所居住的“芦草洼”深刻体现了地域之间、民族之间的流动性和交互性,阐释了多民族的文化特质和民族关系结构是移民群体地域认同的双重载体与容器。

关键词:移民群体;身份认同;重构

10.16023/j.cnki.cn64-1016/c.2024.02.009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7-1079(2024)02-0072-11

移民问题说到底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身份认同的文化问题。文化是塑造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移民在来自“故乡”的我与置身于“他乡”镜面之间不断徘徊与审视自己,问询着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要到哪里去?这是一个调适和实践的复杂过程,是新旧身份不断转换的微妙过程,在移民的嵌入和融入中,新旧身份所形成的不断调适与实践的共同体,从而创造出“新的联结和归宿的象征模式”^[1]。近十年来关于政策性移民的身份认同研究成果也逐渐丰富起来,主要涉及水库移民^[2]、工业移民^[3]、三线移民^[4]和南水北调移民^[5]等不同研究对象。从研究领域上讲,主要集中于社会心理学和民族社会学,从社会性别视角、民族志和田野调查的方法等分析生态移民的身份认同^{[6][7][8][9]},其中涉及芦草洼移民群体身份认同的有关研究较少,主要有马建福^[10]和祁莉霞^[11]。

人口迁移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常态,“即使是对乡土情结浓厚的中国人来说,背井离乡也司空见惯,所谓的

收稿日期:2024-03-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中国70年来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演变及其基本经验研究”(19BJL011)。

作者简介:田晓娟,女,宁夏同心人,博士,宁夏社会科学院综合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学。

家并不是既定的一成不变的空间,人们总是在流动中慢慢远离家乡,建设新家的同时培育着新的认同。”^[12]芦草洼移民群体从西海固山区迁移至银川北部平原,在新的生存空间下,从一种较低的、传统的生计方式转向一种附加值更高的生计方式,所面对的不仅仅是居住环境、生计模式、生活方式等与移民切身相关的实际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关于她们独有的历史记忆、形成的地方记忆与群体意识关系以及“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将去向何方?”等一系列的问题,逐步接受和平衡因人口迁移因素所带来的心理期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使自我和不断变化着的环境的有效联系得以重建,避免移民群体存在感的不断消逝,而其身份认同也在不同的情境下产生不同的变化,呈现多重性、层次性和不确定性。

一、泾源山里人:拥有“历史记忆”的移民群体

为什么说泾源山里人是拥有“历史记忆”的移民群体?这源于百年前陕西回族一次较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活动。泾源人是宁夏西海固山区的较为特殊的一个群体,是以“历史记忆”认同维系着的一个突显地域性与民族性的双重属性的群体。文化的认同主要是基于群体成员有着共同的祖先、历史和文化渊源等先决条件,形成群体认同的基础是基于该群体成员的共同性历史记忆(或者是经历)。那么,一个地域群体的形成与变迁也遵循着这些法则。每一个群体都有自己的历史记忆,“历史记忆是一种集体记忆……记忆具有传承性和延续性……同时记忆本身也是一个历史,是一个不断传承、延续的过程”^[13]。目的在于明晰“我是谁”,我有怎样的过去,过去的“我”与现在的“我”之间维系着怎样的情感?

(一)族源里的“历史记忆”

历史记忆与认同变迁常发生在移民情景之中,“人口迁移”成就了移民群体重要的历史记忆。在田野调查中笔者按照第一代移民、在吊庄出生、成长起来的第二代移民的安排进行访谈,以便了解不同代际移民之间对于族源里的“历史记忆”有怎样的认识。

问:“你知道你们祖上是从哪儿迁来的?”

甲:“咋说呢,那是一段痛苦的回忆,是一段过去的历史。”(YDL,兴泾镇惠台村,45岁,移民,2021-07-02)

乙:“听我妈说,我们是逃难逃到这儿,至于为啥,就不知道了。”(LXX,兴泾镇兴盛村,38岁,2021-06-29)

丙:“从搬迁时我就到吊庄工作,已经近四十年了,从土地测绘干到民族工作,我是通过读书知道的,在上学的时候看过《民国化平县志》,还看过《东望长安》的小说。”(HJH,良田镇园子村,60岁,2021-07-05)

当笔者提及陕西回族因何原因迁移至泾源县时,人们往往缺乏清晰的记忆。一说是逃难至此,一说是被赶到此地,还有少部分人不知道原因。移民对于“陕西回族”迁移至泾源县的看法另有看法。其中的缘由有二:一是人们对于历史记忆是模糊不明的,陕西回族迁移至泾源县已有百余年历史,在人们口耳相传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记忆模糊,这时人们可能会根据自己的主观想象作为真实的历史进行叙述;二是“记忆”理论探讨的是建构中的“历史”,既有选择性记忆,也有结构性失忆。笔者并不想讨论陕西回族迁移至泾源的原因,而是借此探讨移民对于这种地域的身份是否认同?为此,笔者做了相关的问卷调查(表1,表2)。

表1 您听说过有人去陕西渭南寻根的事吗?

选项	听说过,很清楚	听说过,但不是很清楚	没听说过	合计
人数(个)	42	89	19	150
百分比(%)	28%	59.3%	12.7%	100%

表2 您认为百年前祖籍地(陕西渭南)与自己有多大关系?

态度	人数	百分比
有很大关系,因为知道自己根在哪里,很激动。	21	14%

续表 2

态度	人数	百分比
有关系,可以知道自己民族和家族的历史,很高兴。	34	22.7%
一般,说不清楚。	45	30%
关系不大,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29	19.3%
完全没有一点关系,无所谓。	21	14%
合计	150	100%

由上可知,大部分移民听说过有人到陕西渭南寻根的事,只有 12.7% 的移民表示没有听说过。事实上,芦草洼移民与陕西回族之间并没有直接关联。从访谈中了解到,移民获取自己的祖籍地信息的渠道主要是来自父辈的口耳相传和通过书本知识的学习。换言之,对于陕西回族地域身份认同主要是源于移民对族源的历史记忆,集中地反映在人们寻根思想意识深处,在当前现实生活中人们并不经常使用这一身份,所以移民对这一身份的认同具有内在性和潜隐性。虽然在日常生活中,个体并不总是处于我群或他群的身份选择与认同选择的具体情境之中,但由于其后来所处的更高层次、更为精细化的社会化过程赋予了个体更多的身份,对于个体而言是更为重要的其他身份,使得群体意识成为一种潜隐的身份意识,但是这种意识始终存在于个体之于自我身份的认知整体之中,并在认同的情境中呈现,目的在于维系这一文化的亲和性。

(二)地名里的“历史记忆”

“历史记忆是共同体成员对共同的历史情感体验进行反思和想象所积淀的不在场回忆。”^[14]地名作为文化符号的一部分镶嵌在人们的历史记忆中,“是一个地域文化的载体,一种特定文化的象征,一种牵动乡土情怀的称谓”^[15]。地名和移民的关系最显著的是移民把旧地的地名搬到新地^{[16]73},不仅承载着地域文化特征,蕴含着少数民族心理的真实情感,再现了芦草洼移民群体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的变迁历史。“一个民族迁到一个新的无人区时也会带入原来的老地名。”^{[17]4}移民群体以复制故乡的地名来标志被“迁移”安置的“他乡”,目的是通过复制家乡的地名展开在“他乡”的“故乡”,并以此让我们看到一个在地域上被割裂的群体是如何构建其地域认同与群体认同。从侧面阐释了移民群体如何通过移民地的重新命名来塑造“寻根”的事实,从而达到凝聚新的地域认同与群体认同的目的^{[18]96}。

“泾源县现在的一些村名,来历基本上沿用陕西原籍时的旧村名,缘于三个原因:其一,表达当时人们对祖籍的怀念之情;其二,由于当时被安插到泾源时,并不知道这里原来的村子叫什么,就起旧名;其三,从陕西来的移民在原籍时同姓基本上是一个村子的,到泾源后又安插到一个村,当时陕西原籍的村名叫什么,现在泾源的村民就叫什么。……十里滩(泾光)来源于同州沙苑十里滩,大多数人姓伍、吴、常等……大园子、小园子村来源于大荔县沙苑回族 36 村。”^{[19]546}

芦草洼地名承载着移民群体的历史记忆与个体表达。“地域认同首先是对一个具体可感的地理空间的群体身份的体验,这种情感体验与群体身份是密切相关的,比如通常人们对于家与家族的概念、族源地与徙居地的历史记忆等。”^{[20]43}如芦草洼移民群体的地域认同,就缘于迁徙地的历史记忆。地名留下了移民的历史踪迹,从一些移民聚居地的命名里可以看出其与原乡的联系^{[21]274}。对芦草洼吊庄的很多村落的“命名”如今仍然沿用其在泾源县老家的地名或村名,人们虽然不囿于老家的“同族成村”,但依然围寺而居,保留浓厚的泾源乡音和故乡的饮食生活习惯,如兴泾镇的“兴盛村”,其名字来源于泾源县兴盛乡。这种复制地名的想象说明,移民群体由于生态环境恶劣,缺乏耕地等原因而无法生存,通过人口迁移的方式实现个体在地理空间上的置换,携带生存空间的地名符号,将地名这一符号进行移植,从而在移民群体的移居地复制出另外一个“家乡”(表 3)。

表 3 芦草洼移民群体迁入地、迁出地及历史寻根地名调查表

现在的村名	泾源县老家地名	历史寻根:沿用原籍地名
十里铺村(兴泾镇)	十里滩	原陕西同州府沙苑十里滩

续表 3

现在的村名	泾源县老家地名	历史寻根:沿用原籍地名
黄花村(兴泾镇)	黄花乡	吴忠金积堡
惠台村(兴泾镇)	惠台乡惠台村	原籍陕西邠州(今彬县)白吉塬(今北极镇)
兴盛村(兴泾镇)	兴盛乡兴盛村	陕西王阁村
涝池村(兴泾镇)	涝池乡	陕西九社
园子村(良田镇)	香水镇园子村	大荔县沙苑回族36村

(资料来源:根据拜学英《泾源回族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及笔者田野调查整理所得)

(三)方言里的“历史记忆”

斯库特纳博—康格斯说过,人们之所以有不同的认同,主要是由于他们有不同的语言。语言既是文化与认同的载体,又是认同的标记和其实现的途径。人们通过语言与其他群体保持距离。因此,语言不仅成为群体成员之间的交流媒体,更是作为区分“圈内”“圈外”的工具。它有两重含义:一是我们是谁,二是我们在与谁说话。语言会帮助我们表达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和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且确定、调整和维护彼此的关系^{[22]96}。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除符号系统和交流特性以外,还有“身份认同”的特性,主要集中于地域、社会、群体、国家认同等方面,因为他们是说话人认同中较为稳定的内容,构成其认同的主体。泾源方言属于北方方言区内的中原官话^{[23]363},细分下去属于中原官话关中片区。这与泾源县是移民之地有关。“形成方言的主要因素,一是地理环境和社会共同体的改变。一是不同群体发生接触、影响。这两条因素促使一种语言内部发生变化不一致,产生不同的变体与分支。”^{[24]6-7}清同治元年以前,泾源县境内均为汉族,后由于陕西回族人口迁移至此,县境内才有回族之始。

“左宗棠把当地为数不多的土著汉民强行迁徙到相邻的平凉、华亭、固原、隆德等地”^{[19]110-111}。于是泾源县境内的“汉民有的是原来当地的老户,有的是从固原、平凉迁来的。大部分务农,住在黄家凹(北边)和官庄(西北)二村;在城内和北川的汉人是经商的。县内回民绝大部分是从陕西各县迁来的,也有一部分是从秦安、莲花城迁来的。从陕西迁来的是临潼、渭南、大荔、蓝田、邠州各县的回民,其中以临潼和渭南的为最多”^{[25]442};“开泾源县回族之始”^{[19]1}。

因此,泾源县回族大多是移民群体,而泾源方言的形成也与移民息息相关。泾源方言的形成和陕西回族方言有明显的历史渊源。可以说,泾源方言秉承陕西关中方言,正所谓一脉相承,密不可分,所以笔者听到的多是“秦地之音”。方言具有辨识祖籍地的明显特征,故在地域群体认同中十分重要。方言不仅是地域群体认同的主要外观标志符号,而且是表达与维系情感的符号纽带。用方言交流,不仅传达信息,还交流同乡同族情感。方言的区隔性增强了区域之间的壁垒,增强了方言区内群体的一致性,形成内群体认同。在身处异乡的泾源人眼中,方言如同家乡的一个缩影和烙印,体现着他们的身份认同。随着小城镇化和市场化不断前进的脚步,人口迁移与新媒体的资讯环境正在改变传统的方言共同体的存续方式。关中语、泾源方言在芦苇洼不仅是生活和工作的主要语言,也成为芦苇洼人的文化标识,是芦苇洼人方言身份认同的重要基础。田野调查表明,绝大多数移民(超过90%)具有明显的地域群体认同意识。这些人祖籍特征明显,关中话(后为泾源方言)特征明显,母语关中语自然而然地成了移民自我群体认同的重要基础。可见,移民方言认同是附着在祖籍地认同和亲缘认同之上的标志性符号认同现象。一定地域的方言始于社会发展、政治变动、人们活动范围、社会经济活动往来密切相关的,是一定地域民俗风情、戏曲宗教等文化形式的生动表达。^{[26]320}

综上,“认同也是群体性社会文化‘空间’想象的产物。这个空间不一定就是具体可感的地理空间,也可以是一种群体文化‘心理空间’的社会建构”^{[20]43}。移民群体及其后裔迁移到其他地方后,他们之间看似没有直接联系,但并不表示没有间接关联。他们通过各式各样的方式每时每刻地发生着联系,如共同的历史记忆、复制相同的地名、未改的乡音等,情感上的归属与认同并没有时间的阻挡和空间的距离感。移民与迁徙

地的关系,其本质是在于共同的文化身份或是一种心理空间的共同想象。这种基于共同体想象的体悟,更多的是出自共同享有的族源、地名、方言等文化载体的参照,其追求的目标是共同性多一点、差异性少一些。芦草洼移民群体现实的空间就是移出地百年来两次较大的人口迁移活动的历史参照,从中为我们建构了历史记忆中的“共同体”。

二、芦草洼吊庄人:拥有“集体记忆”的移民群体

由于情感上的原因,“芦草洼吊庄人”一词已沉寂于公众意识深处。污名是移民群体“在地化”过程中常见的现象。由于芦草洼移民群体农本与劳务生计中的亲缘、地缘和族缘性,定居于芦草洼的移民大多有亲属、同乡关系,通过联姻、认干亲等方式,进一步加强了移民群体的姻亲关系。此外,移民群体的身份、相同的生计方式中的互帮互助,又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天然关系。因此,芦草洼吊庄内部形成了守望相助的具有西海固地域特征的氛围。在这种情形下,个人行为不当极易演变成集体行为的矛盾,从而对移民群体产生歧视与偏见。田野调查显示,在芦草洼移民吊庄迁移时期,西海固山区回族与周边川区回族、川区汉族之间存在相互污名化现象。事实上,芦草洼吊庄污名化是移民群体与银川周边原住户群体间地域文化差异在一定情境下与其他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在移民迁移初期,芦草洼移民与银川周边地区老住户的污名互动中形成了认同分类,污名互动表面上制造了社会的疏离,但实际上强调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融入与共存关系,其对移民群体完成在地化和身份认同重构具有重要意义。

(一)芦草洼污名的产生

克里弗德(Clifford)认为,移民本身是一种“旅行的文化”,它包含着“连续和断裂、本质和变迁以及同质和差异的历史性对话”^[27]。移民群体既是人口迁移的受益者又是身份认同的受害者。他们作为城市廉价的劳动力的从事者,本身还承受着很大的身份或者地域污名。“个体在人际关系中具有某种令人‘丢脸’的特征,这种特征使拥有者具有一种‘受损的身份’。”^[28]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诸如身份或地域污名等现象日益突出,芦草洼移民群体的污名属于地域污名。地域是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之一。人们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地域认同的习惯即人的身份只有和地域相联系才具有稳定性,地域是人们身份认同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谁”是芦草洼吊庄移民?芦草洼吊庄移民主要来源于西海固山区的涇源人、同心人、海原人、西吉人或是从外省(甘肃省、陕西省)迁移过来的平凉人和陕西人等。这些在芦草洼土地上艰苦奋斗过的人,都是芦草洼吊庄移民群体的一员,是这一地域共同体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话语被视为一种象征性行为,这种话语的指向性十分明确,而且话语中透露出某种动机,久而久之,这种话语建构出一种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反过来也会赋予话语特定的意义。”^[29]西海固就被赋予一种“特殊的话语”,为其贴上了污名的“标签”:

最初来到芦草洼,两眼一抹黑,那时候,川里人根本瞧不起咱们,说咱们山里人是‘山汉’,野得很,不能招惹。还说咱们西海固人懒得很,整天蹲在那里闲谰,全靠政府的救济款。(MHW,兴泾镇兴盛村,53岁,2021-10-11)

这是银川北部川里人对西海固山里人的描述。“懒惰”俨然已经成为芦草洼移民群体最突出的污名标签。事实上,山区贫困群众中有这种思想的人只占一小部分,然而人们在叙事时却有意地夸大事实,以致受污名化叙事的影响,认为来自宁夏西海固山区的移民群众普遍具有这种等、靠、要的懒惰思想,这是移民群体未搬迁之前所形成的污名化标签。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一方水土养育不了一方人,才有了最初的芦草洼移民。当时人们一心只想着“移出去”,但忽视了如何在这片西沙窝里生存与发展的现实问题。搬迁过程十分艰辛,移民群体缺乏必要的劳动技能,为了能够生存下去做出一些违法行为。在吊庄移民村建立之初的几年中,包兰铁路成为少数特困移民群众的“粮仓”和赖以维系的生命线:

那时,但凡货运列车经过吊庄火车停靠点,总会放慢速度或停留片刻。在货运列车减速、停留的间隙,有人会冒着危险扒上火车,偷偷卸下煤块子和化肥。周边的老住户经常以嘲讽的口吻对移

民进行贬损,称芦草洼是“贼窝窝”。(WLS,原兴泾镇兴盛村村干部,54岁,2021-06-26)

移民搬迁至芦草洼,自建房屋是一大笔开支,当时的土地还没有改良过来,也没有赚钱的门路,生活十分困难,移民就开始想办法到周边打工挣钱。除了到银川周边打工,芦草洼移民群体主要是到平吉堡农场打工。到平吉堡农场干活大概要走八公里的路,走路需要一个半小时多一点,真正是沟沟渠渠、东拐西弯走到平吉堡去“干活”,其中少数移民为生活所迫开始以偷盗自行车为生,给银川周围老住户留下了十分恶劣的印象,将“吊庄人”与“偷车贼”互为联系,冠以“贼窝窝”的污名。由于周围老住户对西海固移民群体原有“懒惰”的刻板印象的固化,甚至夸大移民个体的不端品行和人格,从而表现出符号性歧视的排斥行为,这是移民群体人口迁移时期所形成的污名化标签。

在移民研究中,本地人和移民之间都包含了大量的污名他者的内容,如移民常被本地人赋予污名称谓,而本地人也避免不了被移民污名。诚如夸梅·阿皮亚(Kwame Appiah)所言,在社群互动中存在一种敌对动力学,即使社群之间表现出分裂状态的时候,他们仍然是统一的整体^{[30]92}。这同时也印证了在中国社会,外部观念的产生使得污名互动的各方在“正当中国社会文化秩序的构想”下既对立又统一的思想。

(二)芦草洼吊庄人的身份认同

芦草洼吊庄人是指从西海固山区搬迁至芦草洼川区的以泾源县回族为主体的移民群体。在这一身份构建的过程中,国家主体性话语体系起到主导作用。换言之,国家主体性话语是“芦草洼吊庄人”身份建构的最为重要因素。国家主体性话语的表达在芦草洼移民群体中具有十分强烈的“改造”意识。“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31]291}随着生态环境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和反贫困意识的逐渐形成,促使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移民政策。宁夏吊庄移民、扬黄灌溉工程移民、易地扶贫移民、中部干旱带县内移民、中南部地区生态移民等都与国家重大战略决策部署紧密相连。“走出大山,脱贫致富”成为移民向往美好生活和走向共同富裕的最高期望,国家以现代化实践行动逐步消解、统一、整合落后的生产体系和小农意识,经济开发区、现代化农业、示范基地建设等具有现代意义的话语表达成为社会主流。只有这些具有现代化的表意实践才是移民选择的正确道路。面对国家移民政策带来的诸多实惠,移民的心里也有自己的“小九九”。“移民又是一种‘窃喜’、迎合的心态,囿于贫困条件下的移民,对国家‘恩赐’不得不进行暂时的妥协,移民既依赖于国家政策带来的各种资源,进而表现出对生态移民的认同,又感触于背井离乡带来的社会不适,进而表现出对生态移民的抵制,这种既外在于‘国家话语的顺从’,又内在于‘民间话语’的抗争的矛盾心理,反映出移民被话语‘束缚’后的行为特征。”^[32]由此可知,“芦草洼吊庄人”这一身份是移民被动获得的,既是国家主体性话语赋予其这一官方身份,也是移民有意识地接受这一身份。

对于搬迁到芦草洼吊庄的首批移民来说,“集体记忆是他们挥之不去的生命体验,同时也是他们对自我身份认同建构的过程。因为有着对过去艰苦创业的清晰记忆,这使得他们认为自己是这片土地上的开拓者和主人翁”^[3]。作为亲身经历并参加芦草洼吊庄指挥部建立、吊庄搬迁与属地化管理等一系列大事件的老一辈移民,他们对往昔的岁月充满着深深的眷恋之情。“昔日芦草洼,荒芜无人家。风吹沙石流,地面草不生。今日芦草洼,灯火照万家。机器隆隆响,沙滩变绿洲。”可见,“芦草洼吊庄人”这一身份在移民搬迁初期是普遍被移民接受与认可的:

1985年,我知道政府要动员一部分人,搬迁到银川搞开发,帮助我们这里的人脱贫致富,我就带着妇儿(媳妇)卷起铺盖儿来到了芦草洼。当时政府分给我两间房和6亩地,生活靠政府供应粮接济。起初,日子苦的就想回老家,想老家的山山水水,但一想到在老家靠吃窖水或走很远的路担泉水的困难日子我就退缩了,再一想芦草洼能方便喝上甜水,就又坚定了留下来的信心。我和媳妇儿在种地的间隙还出去打零工。我在建筑工地管灶,媳妇子在平吉堡农场帮人除草,我们两个当时的月收入600元呢。这样一干就3年,1988年盖了3间砖房。我觉得我来对了,是芦草洼吊庄让我有了梦寐以求的像样的家。(MEF,兴泾镇泾华村,51岁,2021-07-09)

移民对“芦草洼吊庄人”这一地域污名的事实在20世纪80年搬迁初期是毫无意识和防备的。搬迁初期

移民所需要的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原始本能,即在芦草洼安身立命,对于偷盗这一行为,是否违法、是否对其声誉有不利的影响、是否会影响移民后期的社会交往,少数困难移民已无暇顾及,而真正引起移民群体对这一身份的警惕始于移民生活安定后与银川周边群体发生社会交往时,移民往往能切身感受到银川当地人对芦草洼吊庄人的偏见,进而影响到移民群体融入银川本地社会:

我到西夏区人民医院去看病,大夫问我是哪的?我就说我是镇北堡的,不敢说我是芦草洼的。你不知道么,前两年太穷了,我们吊庄有人开始偷自行车,经常坐出租车不给钱,把名声搞毁了。现在出去办事情,人一说我是芦草洼的就不搭理我们,受人嫌弃的。(YGL,兴泾镇西干村,58岁,2021-07-12)

综上,在芦草洼吊庄搬迁初期,面对国家移民政策带来的实惠,对“芦草洼吊庄人”这一身份的获得是普遍接受与认可的。从客观上讲,经过搬迁的过渡期后,生活大为改观,移民开始大量进城务工,加强了与城市其他群体之间的交往交流,高度的文化自觉^①不断促进着移民与周围本地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而适应周边的社会环境。泾源山里人与川区人、不同民族之间不同的文化体系互相接触与碰撞,客观上促进了彼此之间发生交集的可能性。但由于已经被污名化的芦草洼吊庄人的身份,芦草洼移民之间开始抱团,与银川老住户产生隔阂,间接地隔离了移民群体与银川市周边群体之间来之不易的联系。移民群体自身对“芦草洼吊庄人”的身份认同,已经从最初的普遍接受与认可转换为难以启齿的消极与隐匿,从而影响了芦草洼人融入银川这座城市的步伐。因此,移民群体融入城市的本质是其身份认同与重构的过程,而突破融入城市的图圈则在于重新构建身份认同。

三、属地化银川人:移民群体身份认同的重构

2000年,芦草洼吊庄行政区划发生改变,开启了移民属地化管理的新世纪。移民群体难以继续维持“泾源人”原生型的认同和已经被污名化的“芦草洼吊庄人”的身份认同。那么,芦草洼移民面对属地化管理后“银川人”身份的新标签,他们如何看待和接受这一身份?对于这一新身份是否认同?

(一)走出边缘:“银川人”新身份的标签

2000年9月15日,芦草洼吊庄由泾源县正式移交到银川市郊区人民政府管辖。芦草洼移民群体的身份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吊庄移民变成银川人。笔者在田野调查中问道,芦草洼吊庄划归属地管理已经20年了,您觉得自己是不是已经变成银川人了?

笔者与甲、乙、丙三位移民对话:

甲:那不是的,我们说话与银川人不一样,一听就能听出来我们是泾源的。

乙:我爸爸是1984年过来的,我在牙牙学语时随父母迁来吊庄,我们长在吊庄,读书上学在吊庄,虽然芦草洼已经划归银川市了,但我觉得我还是三村(兴泾镇泾华村)的。

丙:我们吊庄因为穷曾经把名声搞坏了,但是我们大部分人在这里可以说是白手起家,苦干出来的,人怎么能忘本呢。

可见,移民群体对泾源人的身份和芦草洼吊庄人的身份难以忘怀。尽管芦草洼吊庄人的身份曾一度影响了移民本身和银川市老住户对其原有的认可,但是移民群体对这一身份的认同并没有随着吊庄由泾源县垂直管理变为银川市属地管理而发生急剧的改变。笔者于2021年6—7月份分别在兴泾镇(兴盛村、十里铺村)、良田镇(金星村、园子村)4个移民村就“您觉得现在自己到底是哪里人”这一问题进行无结构性访谈,访谈人员120人,每村30人(表4)。

表4 您觉得自己到底是哪里人?

身份地点	十里铺村 (北三村)	兴盛村 (南三村)	金星村 (包兰铁路附近)	园子村 (原芦草洼六村)	合计	比例
泾源人	5	5	7	7	24	20%

续表4

身份地点	十里铺村 (北三村)	兴盛村 (南三村)	金星村 (包兰铁路附近)	园子村 (原芦苇洼六村)	合计	比例
芦苇洼吊庄人	3	4	2	3	12	10%
银川人	18	16	16	15	65	54.2%
说不清楚自己是哪的	4	5	5	5	19	15.8%

本次访谈表明,有54.2%的移民认同自己是银川人的身份,20%的移民认为自己是涇源人,10%的移民认为自己是芦苇洼吊庄人,还有15.8%的移民不确定自己的身份。从中可以看出有百分之五十多的移民认为自己是银川人,但仍然有近百分之五十的移民对新身份认知和认同出现了偏差,对自己“银川人”的身份不予认同。可见,芦苇洼吊庄行政区划的改变并没有主动带来移民群体身份认同的完整转型,他们并不具备完全融入银川市及享有银川城市人应有权利的条件。在研究移民群体的身份认同时,要考虑到移民所处的社会环境、生产生活条件及移民的社会关系等因素。因此,属地化时期移民群体的新身份认同问题的分析,应置于行政区划改变的大环境背景下,分析移民生计方式等方面的变迁对其身份认同的影响,并从社会记忆理论、“污名化”标签理论解释移民群体对新身份认同出现偏差的原因。

(二)移民群体身份认同出现偏差的原因

“严格地说就是我们的认同规定着我们在其中生活和选择的性质差别的空间……那么人们将得到一个更令人担忧的分裂形象。实际上,我们将认为这种人处于深刻的混乱之中。”^{[33]37-42}换言之,认同危机的出现将影响人们的心理健康和健全人格的塑造。对芦苇洼移民群体而言,为什么会为银川人新身份的认同出现如此偏差呢?

1. 银川人新身份标签并未使移民群体获得与之匹配的原住地居民的待遇

身份是个体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重要标志,一定的身份总是与“特定的权利、义务、责任、忠诚对象、认同和行事规则”系在一起^[34]。拥有一定的身份意味着应该享有相应的权利和待遇。芦苇洼吊庄行政区划的改变虽使移民群体获得了成为“银川人”新身份的标签,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银川市郊区人民政府呈文市人民政府《郊区人民政府关于芦苇洼地区教师集体罢课反映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分析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一是吊庄正式移交后的教师进档工资涇源县没有兑现,二是要求享受艰苦地区津贴,三是享受和属地教职工同等工资待遇。随后由于郊区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教职工的诉求得到了切实回应,吊庄学生已于8月30日恢复正常教学秩序。这一事件反映了芦苇洼移民群体与属地化管理后郊区政府的一次博弈,也从侧面表明了走出大山的移民群体对于芦苇洼吊庄属地化后对于“银川人”新身份的迫切希望与认同。2001年12月22日,《银川晚报》的一则消息也充分印证了芦苇洼吊庄人对于建立这种“银川人”的心理期望:

《银川晚报》报道昔日的“吊庄”户今日的银川人的创业致富先进事迹。复员军人丁林光冲破世俗干起了裁缝,卖油郎于长生拥有了榨油坊,禹会龙、禹彩霞夫妇经营服装店,赵武全靠卖辣面子起家。吊庄名称成为过去,吊庄人的穷困和窘迫也成为历史。自归属银川郊区管辖之后,“吊庄”人又多了一分自豪,他们觉得自己是正式的银川人了。

属地化后移民群体获得了银川市居民的身份,但实际上他们与银川原居住地居民存在一定的差距。从身份证来看,移民群体已成为银川市居民的一分子,但在身份证背后却隐藏着不平等的待遇,造成了移民获得的银川人身份与原住地居民待遇不匹配的问题,从而影响了移民群体对于新身份的认可。从客观上讲,银川原住地居民对待芦苇洼移民群体存在着歧视和偏见,仍将其看作是西海固“山里人”、看作是“芦苇洼吊庄盗贼”,无论是身份认知和社会地位上都低于银川市原住地居民:

2000年以后,我们吊庄交给银川市管了,终于觉得自己现在成了银川人了。但越往后越感觉银川人还是把我们当芦苇洼吊庄人看。(YXH,良田镇园子村,52岁,2021-08-05)

2. 移民群体的乡土记忆与集体记忆会影响移民群体对新身份的认同

对于芦苇洼移民群体来说,芦苇洼吊庄的形成与艰辛的开发建设历程,使其多少保留了原来作为“泾源山里人”和“芦苇洼吊庄人”的乡土记忆和集体记忆。移民对于银川人新身份的重构与认同,都无法脱离过去“地方性知识”的身份经验和芦苇洼土地开发建设中的身体感知。“我自己的生活史总是被纳入我从中获得自我认同的那个集体的历史之中的。”^{[35]221}因此,芦苇洼移民对于新身份的认定,自然而然回到过去的“自己”的记忆当中,而移民群体记忆中抹不去那份融入血脉深处的乡土经验和刻骨铭心的身体感悟,支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形成他们的惯性行为模式。从田野调查来看,第一代移民虽然住进了和城里一样的楼房,但有的还是在继续种地养牛,没地的就到兴泾镇南三村的地头上转转。有的老移民回想起自己刚来芦苇洼进行农业开发建设的情景:大家一起住地窝子、一起辛苦搭建土房子、一起学习修渠灌水、一起平整田地。这些点点滴滴总会时不时地浮现在他们的脑海里,让人难以忘怀。“他们过去有什么,他们过去是什么,都成了他们的认同。”^{[36]65}可见,移民群体的新身份认同深深地打上了他们过往生活的烙印,正是乡土与集体记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他们对“银川人”这一新身份的认同:

我在泾源老家时,“靠天吃饭”,干的是山区的农活;搬迁到芦苇洼,干的农活是“靠黄河水吃饭”,干了一辈子农活,现在条件好了,娃们让我享福就不让干农活了,我也没感觉到现在变成银川人,骨子里还是觉得自己是泾源县搬迁过来的“吊庄人”。(DLG,兴泾镇泾华村,49岁,2021-07-09)

3. 整体搬迁的易地安置方式和污名强化了移民群体是不同于“银川人”的另类群体

芦苇洼吊庄是1983年国家实施“三西”农业建设计划后,针对一些生存条件恶劣、自然资源匮乏,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的特困地区采取的行之有效的扶贫开发形式。吊庄移民属于整体搬迁、易地安置和集中居住,有如下特征。第一,芦苇洼吊庄成片开发建设,呈相对独立和封闭之势。搬迁之前的泾源县属于“文化孤岛”。迁移之后,芦苇洼移民群体生活在银川市西南近郊区内,与城市居民小区相距较远,成为地理位置上相对独立的文化“飞地”。第二,芦苇洼吊庄原为一片西沙窝,无基础设施,所有配套设施都在移民群体迁移来之后,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建起芦苇洼的一砖一瓦,目前居住区的各项配套设施依然不健全,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根本改善。第三,芦苇洼吊庄建设之初,人员流动复杂,社会管理较差,使得芦苇洼吊庄成为一种有别于其他社区的特殊移民聚居区。第四,芦苇洼常年风沙,灾害不断,农本生计不能完全解决移民群体的温饱问题,部分移民以偷盗自行车为生。生活在这样的社区中很难让人将他们与银川市居民联系在一起,移民群体如同被贴上了与原居住地居民不同类别的歧视标签。对于芦苇洼移民群体来说,居住的地理位置、形成的文化“飞地”以及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因素,将芦苇洼移民与其他类型社区中的人们区别开来,形成了“我群意识”^②和“他群意识”。对于银川市原产地居民来说,他们不愿意把芦苇洼移民群体纳入“我群”,接纳移民群体是原产地居民自降身份与地位的举动。相对于移民群体而言,整体搬迁的易地安置方式和污名化结果,也会使移民对自己的新身份产生怀疑和摇摆,也就默认了他者对自己“山里人”或者“芦苇洼吊庄人”身份的看法。

(三) 移民群体代际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是一种包含群体意识的集体现象,是最基础的、最深刻的、最为持久的表征。在现实社会中,群体认同是具有复杂性、动态性和不确定性。其复杂性和动态性源于它的过程性,根植于思维、行为和情感等心理过程,不确定性源于一个基于记忆、意识、生物有机体特质、社会结构和社会情境等互动和影响下的社会结果。芦苇洼“第一代移民”是指从1983年以来搬迁至芦苇洼吊庄的移民群体。“第二代移民”是指“生于斯,长于斯”的芦苇洼移民群体。大多数第一代移民更加认同“泾源山里人”的群体身份,但有部分移民的身份认同却徘徊于“泾源山里人”与“属地化银川人”的群体认同之间,处于“半个银川人”或“双重边缘人”的境地;第二代芦苇洼移民则呈现出对“属地化银川人”和“泾源老家”的双重认同倾向,且对“泾源山里人”的身份认同弱于第一代移民。这两代移民同时对“芦苇洼吊庄人”身份认同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消极态度和隐匿。第二代移民由于长期脱离于泾源老家的生产生活环境,他们对乡土社会产生了一定的距离感和陌生感,乡土认同呈现逐步弱化的态势;与此同时,银川这座城市并没有完全接纳他们,社会资源也不是平等地向其开放。与

直接依附于土地生活的第一代移民不同,第二代移民处于乡土社会和城市文明的夹缝中,他们虽然对城市生活充满期待,但缺乏乡土认同,现实的情景常常会表现出认同错位,他们生活在无法回到农村、又无法融入城市社会的双重悖论中^[37]。在田野访谈中曾问移民:您感觉自己现在是哪儿的人呢?移民笑着说,那看咋说呢?在银川人面前,我就是金凤区良田人;在良田人面前,我就是泾源人;在泾源老家面前,我就是吊庄人。可见,移民群体的身份认同的确是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且这种多重性的叠加认同在移民群体中还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对于第二代“生于斯,长于斯”的芦苇洼移民而言,其儿童成长期和价值观的形成发展都是在银川市近郊或者市内,他们认同自己是银川人的感受,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又是芦苇洼吊庄人的后代,行政区划的改变和身份认同之间的矛盾,造成移民身份认同的摇摆与分离,将属地化银川人身份、芦苇洼吊庄人身份以及泾源山里人身份作为独立的身份认同类型。所以,移民群体身份认同的变化,是一个不断创造自己的生存状态、实现自我认同、不断跨越“边界”、不断开拓个体多种“可能性”的过程,这也是为什么移民群体的“多重认同”是具有现实可能性的。这种认同的多重性对第二代“生于斯,长于斯”的移民群体,在心理发展和文化适应上具有一定的消极影响,他们在总体的心理健康水平、社会文化适应、情感的表达以及社会认知等方面缺乏统一的、稳定的社会认同。与此同时,相对于第二代“生于斯,长于斯”的芦苇洼移民群体,第一代移民群体对城市人的生存现状表现出强烈的向往和羡慕。

四、结 语

移民群体在社会心理层面并非独立而统一的群体,历史记忆、乡土记忆、身体记忆、搬迁期望、城市融入等都是制约移民群体身份认同的重要社会心理因素。这里,历史记忆是移民群体通过父辈口耳相传的方式,维护对这一地域群体的历史渊源、方言、地名、文化习俗以及心理认同等有关群体内部的记忆,表达了移民群体在“他乡”对乡土不舍的离散、对“故土”心灵的皈依。对于芦苇洼移民群体来说,族源、地名、方言所标志的空间符号意义不仅强化了移民群体共同的历史记忆,更为重要的是它代表类似“芦苇洼吊庄”这样一个地域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反映出从封闭束缚的环境走向一个开放自由的环境,地域认同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同族成村”到“杂居成村”、从家族走向“离散”、从离散走向地域共同体的过程。乡土记忆是移民群体保留对农业生产、社会关系网等有关泾源老家的记忆与联系。迁移之前,从事农业时间越长,乡土记忆越深厚,故土越难离,移民搬迁的阻力就越大。“山里人故土难离,县上、乡上干部动员向黄河新灌区移民的效果并不理想”^[38]。而搬迁是移民群体对移居地的美好期望,期望越高对移民群体在移居地生存的推动力越大。这一时期是移民迁移至芦苇洼的“高峰期”,他们开始逐渐定居芦苇洼,但他们很多人穿梭于泾源县与芦苇洼两头。移民群体从生于斯长于斯的“泾源县”迁移至人生地不熟的“永宁芦苇洼吊庄”,从封闭的大山来到一个开放的地域空间,身份上经历了从泾源“山里人”到芦苇洼“吊庄人”的身份转换,体现了外来移民群体如何适应与融入新的地域空间;地域上经历了从西海固的“泾源县”到永宁县“芦苇洼吊庄”再到属地化“银川市”的地域转变,体现了移民群体远离家乡后在新的空间中如何培育出地域共同体的认同,这是一个文化自觉的过程。

注 释:

①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参见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188页。

②美国人类学家亚当斯(R.N.Adams)曾提出人类社会中的“我群意识”(we group consciousness)的现象。“我群意识”又称“群内意识”(in group consciousness),是指个人与集体的一体感。这种一体感产生自日常或者周期性接触过程中的亲缘、地缘及其他事实,是共同的利益感、经济需要和友谊的联结以及心理上对群体的依附。参见R.N.Adams.“Ethnocentrism and in group consciousness”,*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53, No.4, 1951, pp.598-600。

参考文献:

- [1]李建盛. 移民文化与身份认同[J]. 中华文化论坛, 2016(9).
- [2]向安强, 薛小龙, 梅畅, 朱洁怡, 安宓. 身份认同、文化适应与社会排斥: 广东省博罗县水库移民社会适应状况调查分析[J]. 古今农业, 2017(4).
- [3]王锋. 单位制背景下第一代工业移民的身份认同——以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矿务局为例[D].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20.
- [4]张勇. 三线建设移民的内迁、去留与身份认同——以重庆地区移民为重点[J]. 贵州社会科学, 2019(12).
- [5]刘方方. 记忆、交往、重构——南水北调移民身份认同研究——以南阳市淅川县四个移民村为例[D]. 合肥: 安徽大学, 2016.
- [6]陈琼. 移民身份认同研究——对三峡库区两个案例的解读[J]. 妇女研究论丛, 2007(6).
- [7]付海鸿. 三江源生态移民的文化变迁与身份认同研究——以格尔木昆仑民族文化村为例[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 [8]周甜. 牧民? 农民? 市民? ——浅议三江源生态移民社会角色的特殊性[J]. 青海民族研究, 2009(4).
- [9]徐婧. 三江源生态移民身份认同研究——以青海玛多玛查理村为例[D]. 银川: 北方民族大学, 2015.
- [10]马建福. 应对与认同: 西海固人在银川——移民区卢草洼的个案[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6).
- [11]祁莉霞. 宁夏银川市兴泾镇移民社区的地域身份认同研究[D].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2010.
- [12]李军. 西北少数民族生态移民社会适应分析[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3).
- [13]赵世瑜. 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从20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史学[J]. 中国社会科学, 2003(2).
- [14]宣朝庆, 葛珊. 历史记忆与自我认同: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自觉[J]. 人文杂志, 2021(12).
- [15]冯骥才. 地名的意义[N]. 人民日报, 2001-11-13(12).
- [16]周振鹤, 游汝杰. 方言与中国文化[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 [17]苍铭. 云南边地移民史[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4.
- [18]樊莹. 族群如何记忆——六盘山泾河上游“陕回”族群的民族学研究[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8.
- [19]拜学英. 泾源回族史略[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9.
- [20]祁进玉. 群体身份与多元认同——基于三个土族社区的人类学对比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 [21]谭刚毅. 两宋时期的中国民居与居住形态[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8.
- [22]蔡永良. 社会语言学十讲[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8.
- [23]泾源县志编纂委员会. 泾源县志[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5.
- [24]林嘉书. 土楼与中国传统文化[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 [25]马长寿. 马长寿民族史研究著作选[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 [26]陈世松, 等. 大移民“湖广填四川”故乡记忆[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5.
- [27]Clifford, J. Traveling culture [M]//Culture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 [28]欧文·戈夫曼. 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M]. 宋立宏,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 [29]聂君. 宁夏生态移民社会关系重构影响因素与干预策略研究[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20(3).
- [30]夸梅·安东尼·阿皮亚. 认同伦理学[M]. 张容南,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
- [3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32]王著. 生态移民: 国家与移民主体间的话语分析[J]. 广州公共管理评论, 2016(00).
- [33]查尔斯·泰勒. 自我的根源: 现代认同的形成[M]. 韩震, 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 [34]张静. 身份认同研究——观念、态度、理据[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35]Alasdair C. MacIntyre, 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 (Third Edition), Notre Dame[M].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07.
- [36]Castells, Manuel. The Power of Identity (Second Edition) [M]. Oxford: Blackwell, 2010.
- [37]管健, 戴万稳. 中国城市移民的污名建构与认同的代际分化[J]. 南京社会科学, 2011(4).
- [38]蔡锦荣. 吊庄人[J]. 朔方, 1986(9).

责任编辑: 王玉强